

“重本抑末”評析

自孩提時起，學習歷史，總被告知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政府如何實行大一統、中央集權及“重本抑末”，等等。時至今日，農業仍然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以佔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以上的人口，這仍然作為事實，而被經常地宣傳、強調。

誠然，上述種種確實反映了歷史，是歷代的國策，或歷史的總結。然而，歷史傳統未必就是未來理想的模式。歷史傳統如不細加分析，批判地繼承，很可能轉成沉重的包袱。因此，研究歷史、承認現狀，不等於囿於歷史、安於現狀。一個發達的國家，不需要絕大多數人搞飯吃，它可以用工業品或金錢去換取或購買糧食；一個發達的國家，人們的主食不一定非是五穀不可，而可以用更多的食油、副食品等來加以增補。雖然我們目前還做不到，但不等於將來也做不到。我們現在的改革、努力、奮鬥，不正是為了使國家更強、人民更富嗎？

有鑑於此，本文擬對歷代的“重本抑末”國策加以評析，看看這種政策數千年來如何促成、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但又如何長期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大踏步向前發展。

農業社會是人類歷史的初級形態

“重本抑末”其實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產物。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國家政府要維持自己的集權統治，必然要推行“重本抑末”，亦即“重農抑商”的政策。否則，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將被破壞，而執政者也將被推翻。

不過倘若吾人對古今中外的歷史，展開比較性的研究，則可見農業社會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種初級的形態。

綜觀人類歷史，如以生產力的發展來考察，吾人曾見過“有力闢

蕩天下”(靠狩獵維生)、“有權橫行天下”(以農業為本)、“有錢旅遊天下”(依工商運轉)等階段，也許過了很久很久以後，人世間終會出現“有才名聞天下”(憑科技推進)乃至“有理走遍天下”(按正義判斷)等奇跡。中國民間常將不同職業的各界，稱為工、農、兵、學、商，若從人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這五界在歷史上的某階段都起過或將起到主導的作用，試觀下表：

狩獵社會：有力闖蕩天下(弱肉強食)	強權——	兵
農業社會：有權橫行天下(強權政治)	——	農
工商社會：有錢旅遊天下(金錢鑽營)	智慧	工
科技社會：有才名聞天下(科學至上)		商
正義社會：有理走遍天下(平等博愛)	公理——	民

茲略加詮析如下：

(一) 狩獵社會：在初民時代，人們靠簡陋的工具來對付自然界，尤其是兇猛的野獸，強健有力的身體是極端重要的。所以勇武的戰士最受擁戴，而其中有才幹且公正者，便成為領袖。後來權勢雖已轉移到帝王手中，士兵成了此後各種統治者的工具，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等，仍受這種武力強權的極大影響。至於武俠小說中的“武林”社會，則充滿對昔日以武稱霸光榮歲月的回憶。

(二) 農業社會：人類自畜牧社會而跨入農耕社會，私有制已產生並逐漸發展，權力的中樞操在經營農業的地主(或封建主)手中，而歷朝皇帝則是他們之代表。在這種社會，有權便有一切。而由於廣大農民的愚昧，則專制、強權、官僚統治必然大行其道。循此而進，將步入工商社會。

(三) 工商社會：在這一階段，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的鑽營雖不免被人視為“邪惡”，但它已非純由強權所致，在許多方面需要運用特殊的“智慧”(包括投機取巧等)方能奏效。其中又可分為下列兩個時期：

1、工業社會：從西方來看，產業革命後，由地主脫胎而出的工廠主曾經以優越的機製品向世界擴張，其勢力一度風靡全球。

2、商業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日趨壟斷，托拉斯、金融巨頭的出現，過去令人歧視、四處兜售的商人逐漸取代了工廠主的地位。所謂帝國主義的出現，正是由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的過渡。

(四) 科技社會：當金錢泛濫成災、財富遍地橫流之際，人類會不會過渡到以“士子”為中心的科技社會，這是一個接近現實的問題。讀書人雖一向自視清高，但從來像皮上毛一樣，先後依附於武人、國王、地主、工廠主或商人等。今日世界越來越需要發揮智慧的力量，而科學家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試想，在一次航天的飛行試驗中，千萬工作人員屏息以待總設計師或總工程師的命令，零點一秒之差即足以決定成敗。科技界如此，而未來的世界呢？

(五) 正義社會：人類一旦由最有智慧、最有才華者領導，則應距數千年來無數先輩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或“共產社會”不遠了。屆時社會前進的動力是甚麼？殘酷的競爭應可摒除，但絕不會是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流行。社會極可能受一種類似體育競賽的“公平規則”所制約，鼓舞人們競賽的動力，可能包括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追求人們愛戴的榮譽感，以及為了獲取應份所得的各種獎勵(包括旅遊、休假及其他物質獎品)等等。

倘若上述分析有一點道理的話，在農業社會之後不是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嗎？正所謂“路漫漫其脩遠”。那種“重農抑商”的主義在歷史上雖有其必然，然而滄海桑田、時過境遷，吾人不是應該逐漸把它扔進歷史的博物館中嗎？

“平原文明”與“海洋文明”比較

農業社會既為全體人類所必經或曾經，則“重農主義”自非中國

的專利，而在東、西方歷史上都曾流行於一時。那麼，為甚麼中國的
小農自然經濟傳統悠遠而深固，中國的“重本抑末”思潮流長而盛
行？看來這同中華文明所由誕生的地理環境及民族性格不無關係。

歷史唯物論向來重視生產方式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但這種
生產方式不僅指人生產物的物質生產方式，尤其指人生產人的人類自
身生產方式，只不過後者的重大作用往往要數萬、數十萬或上百萬年
才能被顯著地看清楚。而小至家庭，大至民族、種族，均與人生產人
的方式及其影響密切相關，各個民族又均長年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社
會環境中。正如歷史發展除必然的規律之外，往往會受一些個人性格
所影響一樣，不同民族在參加創造歷史的同時，也一定會打上其民族
性的烙印。因此，吾人在研究歷史時，既要考慮到歷史發展必然性
(客觀規律)和偶然性(個人作用)，也要兼顧介於此二者之間的民族、
地理諸因素。

世界上有難以計數的民族，但如以其所居的地理條件論，似可
歸納為平原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等等，而且地理環
境對各種民族的性格肯定有不小的影響。一般來說，平原民族多居於
河川附近，自古以來以經營農業為主，兩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
河)、尼羅河、印度河、黃河流域的東方四大文明即屬此類。其民族
性呈現勤勞、忍耐、固守等特點。海洋民族如古代的希臘、羅馬以及
後來西歐一些國家的居民，其特點是開放、進取、冒險。游牧民族在
歐、亞洲都不乏其例，中國北方在歷史上常受其威脅，如匈奴、突
厥、契丹等等。其民族性的特點是驍悍、粗獷、豪爽。至於山地民
族，如尼泊爾的廓爾喀人等，其民族特點是驍勇、執著、忠誠。

本來世界早期的文明中心主要在亞、非二洲，起源於大河附
近，被稱為“河川文明”，或發展為“大陸文明”。其經濟以依賴河流
灌溉的農業為主要產業，反映農業生產是繼狩獵、畜牧之後的重要經
濟部門。但平原的農業文化雖利於耕稼，卻呈現另一種特點：從事農

業以為生計者，全部心血都傾注於土地上，其命運端賴一年一季或兩季的收成。他們很少遷徙，至少要等播種後的收成到手才能走，更多的是世代為改良土壤、增加收穫而在忙碌。因此，河川流域的居民雖然勤勞、忍耐、安土、樂業，但也不無保守、閉塞、孤立等習性。而植根於大陸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思想文化，也往往呈現穩定、固守甚至僵化的特點，廣大平原人口的絕大多數自是終身務農的居民。中國古代專制集權制度的長期性、頑固性，中國自古以來的以農立國、重農抑商，應與此有著密切的關係。

反觀希臘、羅馬等西方文明的淵藪，由於他們瀕臨地中海，缺乏源遠流長的大河，因而被稱為“內海文明”，後乃發展為“大洋文明”。這種文明屬於商業文化，便於貿易，因此其民族性偏於進取、冒險。從事海洋貿易的商人，他們的財富往往全部繫於船上，只要能發財致富，船到哪裏，哪裏就是“祖家”。這就不難理解，導源於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商業、航海傳統，如何藉美洲新大陸與東印度航路的發現，締造了今日歐、美的資本主義文明；而比地理大發現至少早半個世紀的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並未帶來甚麼實質性的變化，其後朝廷依然厲行海禁，使國家猶如死水一潭。由此也可以看到，奉行“重農抑商”的民族，在人類歷史競賽中，一度曾居於領先地位，但中途卻逐漸落後，需要改弦更張。

古代中國是農業文明最後堡壘

同為古代東方文明的發源地，雖然較之近代歐美都顯得有些落後，但中國和埃及、巴比倫、印度等還是有所不同的。因為，北非、西亞、南亞那些大河流域的文明比較早就衰落了，它們自身並未隨著歷史發展而同步行進，反而因為內亂、外侵而削弱乃至停滯不前。只有中國在東亞的廣大平原，在整個古代一直保持並發展了聞名全球的“河川文明”，從而成為世界農業文化的最後堡壘。

在中國，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的，號稱“以農立國”。那種“男耕女織”的田園式風光成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業的象徵，其基石則是充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為了自給自足，一定要“重本”；由於自給自足，必然會“抑末”。

所謂“本”、“末”，是春秋戰國以後對經濟部門的一種劃分。《鹽鐵論·本議》說：“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本”即“本業”、“本務”或“本事”，指農業（包括家庭紡織業）；“末”指“末業”，或又作“末作”、“末事”、“末產”、“末生”，指商業流通及一部分奢侈品生產（後擴大為整個工商業）。戰國時，魏李悝認為“農傷則國貧”，“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這裏的“禁技巧”即“抑末”甚明。後來商鞅明確提出“事本禁末者富”，《管子》作者則主張“務本而去末”。韓非，更將整個工商業都歸入“末”的範圍，要求“困末作而利本事”，“趣本務而寡末作”。到了秦、漢，“重本抑末”或“強本弱末”、“重農抑商”便被中央王朝正式確定為國策，並沿襲兩千餘載。

長期以來，歷代王朝進行“重本抑末”政策，對農業發展固起了很大作用，有利於民生安定、統治穩固，但卻有害於工商業的發展，所以也有許多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如東漢末王符認為“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潛夫論》）。宋葉適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紀言序目》）。清王源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輕”（《平書訂·財用下》）。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則主張以迷信、倡優、奇技淫巧等“不切於民用”的行業為“末”，一概禁絕，“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可是由於工商業長期被官府視作“末”或“奇技淫巧”，而加以“抑”乃至“禁”，所以中國古代雖有輝煌的文明，但近代以來卻遠遠落後於歐、美各國。

這裏有一個問題須加辨析：為甚麼中國同西方國家歷史上均出現過“重農”的思想、學派或政策，但它對各自發展的影響卻迥然不同呢？除了前述民族特點的不同外，這應與東、西方歷史進程的不同情況有關。古代希臘、羅馬雖不乏主張重農的學者，但他們充其量相當於戰國時的農家學派，其思想理論均未被明訂為國策。“重農抑商”在中國是公元前221年秦確定中央集權制以後，才定為王朝基本政策的；類似情況在歐洲，即重農主義的盛行，則發生在公元十八世紀專制的法國。二者相差幾近兩千載，且都和中西封建割據消滅、中央集權形成的歷程密切相關。

歷史表明，中國之消滅封建割據、加強帝王集權、形成統一國家、比西方各國要早得多。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統六國之後，中央集權的大國體制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模式，但也成了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嚴重障礙。而在西方，直到中世紀末，才出現消滅封建割據的趨勢。這時，建立統一集權的民族國家，不僅是國王、而且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由此，可見東西歷史的不同特點：中國早就消滅封建割據（雖然後來有反覆），經常保持大國狀態，高度實施中央集權，長期進行重本抑末；而在西方一些國家，君主剛想加強集權，資本主義已經興起，王權迅即式微，重農主義很快走向沒落。

重本抑末與中央集權制相輔相成

如上所述，無論古代中國或歐洲一些國家重本抑末的實施或重農主義的盛行，都與統一集權國家的形成、鞏固密不可分。這一點，在中國尤其看得清楚。

從先秦歷史進程看，由分治而統一成了中國歷史一定時期的發展趨勢。傳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商湯時，諸侯朝者三千；周武王伐商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春秋時見諸經傳的封國，尚有一百七十餘；及至戰國時，大小國家只剩下二十餘，其中

較強者僅七國；最後，終至由秦統一了全國，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之強大、頑固，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在歷代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切權力歸於皇帝，全國武裝由朝廷直接指揮，全國經濟受官僚壟斷，全國統治思想亦由中央決定。以統治思想而言，在秦代以法家治國，西漢初行無為而治，漢武帝後則獨尊儒術；從經濟政策來看，則秦、漢以降均確定為重本抑末。本來先秦諸子百家中有所謂農家（許行等），但其思想對未來產生的影響並不大。相反，力主“重本抑末”的正是同樣主張實行君主集權的那些人，即法家管仲、商鞅、韓非等。他們的政治主張推動了中央集權制的確立，他們的經濟主張則導致了重農抑商國策的制訂，可見中央集權與重本抑末實有難解難分之聯繫。

在後來長期歷史發展中，重本抑末政策更與中央集權制度緊密配合、相輔相成。重本抑末保證了農業社會基礎的穩固，使廣大農村長期保持安定、固守的狀態，農民長期處於貧窮、落後、愚昧的境況，從而利於歷代王朝的專制集權統治。而中央王朝又一再大力推行重農抑商，進一步加強了農業文化的保守性，使中國經濟千百年來幾乎停滯不前、一成不變。

對於秦朝所確立的中央集權及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史家向來多給予積極的肯定的評價，視之為中國歷史的主流，甚至有的把它當成中華民族的驕傲，唯筆者則持有不同的看法。

持肯定見解者多半把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輝煌文化和中央集權加以聯繫甚至等同起來。其實吾人若對歷史細加分析，即可發現此種結論大謬不然。試觀中國的重要典章、制度與藝文，在周代時業已燦然大備。春秋戰國時已廣泛使用鐵製農具，商業貿易也頗繁榮，後來秦漢以降各朝大行“重本抑末”，農具數千年未變，商業發展一直受到阻撓。先秦時學術思想何等活躍，堪稱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但自漢

武把儒術定於一尊後，中國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即大受桎梏。作為中華民族象徵的長城，在秦以前已經興修。都江堰等重要農田水利工程，有許多都修建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文房四寶”的筆、墨、硯、紙，前三者在戰國已經發現。至於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最遲在戰國已經出現，火藥的發明應歸功於煉丹術士，造紙法、印刷術雖然發明稍晚，但未必一定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

誠然，自秦代奠定中央集權制以後的兩千多年來，中國不是沒有發展，但這種發展實在太過緩慢了，而且主要不能歸功於中央集權制。因為在一些分裂割據時期，各地經濟的發展比起一統時並未遑多讓，如六朝時江南一帶的大力開發，五代十國時代南方經濟的普遍繁榮，南宋時海外貿易之興盛，這些在歷史上均有定評。如果說中央集權制有所貢獻，更多地表現在統治術的改善方面，包括厲行保甲制與嚴刑峻法、篡改歷史文獻和消滅前代痕跡、發展避諱之學和鼓勵歌功頌德、加強君主集權和大興文字之獄，等等。不錯，人們通過考古發掘，確曾出土了大量的中國歷史文物，但其中主要乃皇帝宮殿或貴族陵墓中的奢侈品。它們和隋煬帝為個人享受而下令開鑿的大運河，以至帝皇、貴族的木乃伊，哪一項不浸透著萬千奴隸、農夫、工匠的血、淚、汗？！

總之，重本抑末政策造就了中國獨一無二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形成了上層的極端奢靡和下層的極端貧苦。對於這種長期壓得中華民族喘不過氣來的沉重歷史包袱，難道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歌頌並引以為榮嗎？

重農抑商加劇全民族的兩極分化

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極其嚴重而又深遠的。由於它與中央集權制的相輔相成，確保全國永遠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並使之受國家官僚機構的壟斷。所謂以農為本，主要是發展糧食生產，形

成一個全國億萬民眾“搞飯吃”，使中國民眾滿足於“有飯吃”的局面。歷代統治者都習慣於認為中國老百姓所需頗低，但求溫飽而已，政府的責任端在使農業維持一個好年成，因此農村最廣大的居民幾無商品消費可言。結果不僅被列入“末作”、“末事”的工商業長期受抑制，而且農業本身也一直停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落後狀態。

唯其如此，方能理解為何在中世紀同屬自然經濟，西方分散的封建主莊園後來卻較快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而中國農村卻千載如斯、一成不變，蓋中國的商品許多都由官方專賣以供皇室、達官們作為奢侈享受用，而絕大多數民眾的消費水平一直處於極低下的程度。

在重本抑末的國策支配下，不僅工商業屬於“末作”、“末事”，而且科學技術往往被視為“奇技淫巧”而加阻遏。這就使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呈現畸形發展的狀況：一方面有曾經領先於世界的造紙法、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四大發明”；另方面工商業的不發達，卻使社會基礎極為薄弱。西方古代的某些科技發明雖比中國遲，但後來工商業發展的要求卻導致產業革命與海外擴張，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奠下基礎。而中國的羅盤後來卻用作看風水的堪輿，火藥則以燃放節日鞭炮或燄火而有名。

重本抑末的政策造成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給後世留下一個極端落後的農業基礎，造成全民族懸殊的兩極分化。社會階層兩極分化的嚴重，是中國民族（尤其是漢族）歷史的特點之一。一方面上層具有高度物質、文化享受，另方面下層卻非常貧窮愚昧。以主體民族漢族而言，即缺乏比較平均，統一的全民族文化，民族內部上下層之間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差距過於懸殊。

乍看起來，中國缺乏希臘、羅馬那樣發達的古代奴隸制以及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中國農民的生活境況與人身自由程度似乎不低，其實情形並非完全如此。古羅馬的奴隸地位固極低下，但在自由民中，貴族與平民的差距似不比中國大。後來隨著奴隸、隸農與農奴的

先後解放，歐西國家上下層的文化水準及生活程度差距便比東方國家接近，而舉族一致的民族、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自較易奏效。中國自古以來，農民表面自由，但實際上其遭遇並不比歐洲古代隸農、農奴好多少。他們數千年來所忍受的非人待遇，同帝皇、貴族們的奢侈享受相較，實有天壤之別。因此，古代中國雖有驚人的世界先進發明、中國的武器也可進入世界的前列，但小農經濟卻千百年來依然故我，而這種根深蒂固的落後基礎，一時是難以迅速改變的。

中國民族兩極分化的嚴重，中國下層民眾生活的極端極下，既是重農抑商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也是歷代王朝蓄意製造的惡果。眾所周知，愚昧與專制乃密不可分的一雙“夥伴”。在一個充滿文盲的農民國度，要消滅國家壟斷、官僚主義是不可能的。因此，歷代統治者一方面在罪孽的揮霍中耗盡祖國的脂膏，一方面極力使廣大民眾維持在僅足糊口的田地。這樣，農民因有口飯吃而不會起來造反，因沒有文化也不易被煽動造反。當然，歷史的發展往往超越了歷代王朝的主觀願望，一次次的農民起義發生了，但新建的一個個王朝依然採用前代“行之有效”的國策。於是，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長期保留下來，專制中央集權王朝一再被推翻又一再被重建。這個千古之謎始終令人夢繞魂際，百思而不得其解。

對農業民族傳統的繼承或批判

數千年來，中國一向以悠長久遠的“黃河——長江文明”而馳名全球。中原的河川——平原文明使中國成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歷代的“重本抑末”，使中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締造了燦爛的文化；長期的“以農立國”，使中華民族成為最先進最發達的農業民族。

但是，歷史只能證明過去。只有認真研究歷史，才能鑑古而知今，認識現在，展望未來。為此，必須對歷史傳統進行理智的分析，繼承優秀部分，批判乃至摒棄不良因素。擺在面前的，是如何使一向

以農業為根基的大國，比較順利地步入工業化、現代化的途程，取得絕不比其他民族遜色的傲人成就。在漫漫長路中，肯定會遇到無比的艱難、困苦、曲折、犧牲。不過，歷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的眼鏡來觀察的，過去它曾伴隨著可怖的暴力和無數人的血、汗而發展，未來它或許將伴隨無數人的眼淚而繼續前進。

為了改變中華祖國的命運，我們既要認真探索自己民族的歷史傳統，也要對外國的歷史進行研究與借鑑。有時對中、外古今之歷史，展開一些比較性的研究，是饒有興味的。回顧各國走向共和及工業化的歷程，無論在歐洲或亞洲，都各有一個小島國及毗鄰的大陸國作為不同的模式，而且頗有相類之處。這就是：歐洲——英國與法國；亞洲——日本與中國。在歐洲，島國英國最早走向資本主義，但長期保留君主立憲制；而歐陸上的法國原來專制傳統濃厚，比英國遲一個半世紀才發生民主革命，但卻很快宣佈實行共和。不過，十九世紀末的法國仍被人稱為“沒有皇帝的帝國”或“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在亞洲，島國日本最早走向資本主義，但也同樣長期保留封建儀表——君主立憲；而具有數千年帝制歷史、專制傳統冠全球的中國，居然在二十世紀初消滅帝制、宣佈共和。1989年初日本明仁天皇繼承裕仁登基時，還依據《尚書·大禹謨》的“地平天成”和《史記·五帝本紀》的“內平外成”，確定是年1月8日起以“平成”為年號；而《尚書》、《史記》的故鄉中國，卻早已採用公曆來紀年了。

歐陸的法國與東方大陸的中國，為甚麼會較早宣佈共和？也許出於事物慣常的“矯枉過正”的規律，帝皇制度因為太長太強太頑固，導致一種強烈的不滿、厭惡情緒，以致遭到整個民族的唾棄。而日本、英國這兩個島國，雖然迄今保留著君主立憲，但其經濟、科技之發展都頗有可觀，這或與它們國小易治、面向海洋、商業傳統等等因素有關。大陸國家如假以時日，迎頭趕上，其地大物博、文明悠久等優點將會大顯身手，前途未可限量。

總之，研究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從其歷史傳統及現有基礎出

發。中國的現在是中國過去的繼承，中國的未來也只能是中國現在的發展，此外別無奇跡可期。面對中國歷史老大難問題，多少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莫不扼腕歎息，深為吾土吾民命運多舛而黯然神傷。然則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傳統呢？對於故國河山及父老鄉親又該持何態度呢？愚以為對民族文化之優劣理應持分析的方法，既要發揚優良的傳統，又要正視嚴重的缺陷。不過猶如醫療膿瘡、肉瘤一般，我們必須細心除膿割瘤，以免傷害到其他健全的肌體。

一個人不但不能選擇生身的雙親之家庭，也不能選擇自己的祖國、種族，但作為兒女自不會嫌棄父母貧窮，不應嘲笑鄉親愚昧。因此，切忌把億萬農民都視同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更不宜把全中國人都貶為“醜陋”之民。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文明，要說“河殤”，“殤”的只應是數千年帝皇專制傳統之酷烈，而非黃土、黃水和黃皮膚。一個華裔可以選擇外國籍，操最流利的外國語，獲世界最高的獎賞，但他遍歷全球卻改變不了身上的黃皮膚，這是祖先、父母給予他的！因此，不論海內、海外，一切炎黃後胄都應世代代為中華祖國的繁榮昌盛而貢獻、貢獻、再貢獻！

〔後記〕十年前，當我與同窗老友文華、梧桐二兄，在寒舍燕山南溟齋作所謂廈門大學歷史系1954-1958屆“三陳會面”時，記得文華兄曾講了一番精闢的話：“沒有想到我們班‘三陳’都在歷史界奮戰，但各自方式不同：梧桐打的是‘運動戰’（指研究明史尤其是朱元璋，每年在各地刊物發表七八篇文章），佳榮打的是‘攻堅戰’（指用六七年時間編纂《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而我自己打的是‘陣地戰’（指創辦《農業考古》雜誌）”。不久之後，敝人即因播遷南溟之濱而奔碌，雖然並未脫離歷史專業，但再也談不上甚麼學術研究了。光陰荏苒，轉瞬十載已逝，最近我們“三陳”在母校七十周年大慶時，得以和同窗及其他師友聚首於鷺島之濱，實亦人生一大快事。回首往事，文華兄一席話言猶在耳，恍如隔日，爾今《農業考古》的陣地仍在，梧桐兄依然在

“進攻”朱明，唯自己早已無堅可攻了。念及於此，不禁浮想聯翩，感慨繫之。謹書此拙文，為吾友陣地添加一發炮彈，就教於四方大家，亦稍稍過過“學術研究”之癮矣。

佳榮識於香江南溟齋

1991年4月22日

(原載《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另刊於《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香港學津書店2000年增訂版)